

五代矿工百年泪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五代矿工百年泪

*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濰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4021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 2/3·字数 26,000

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30,001—200,000

统一书号：T 3099·334

定 价：(3) 0.14 元

編者的話

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債利高，苛捐杂稅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道：要飯，上吊，坐監牢。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恶霸橫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无恶不作的情形；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慘地位。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三座大山，政治、經濟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想想从前，看看現在，真的換了人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过去，永远不要忘记階級斗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什么是階級、階級压迫和剝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編輯了这套讀物。它包括家史、村史、厂史、地主的罪恶史、农业集体化的好处等几个方面的內容。这些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材料，告訴我們什么是苦，什么是甜。启发我們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望望将来，提高階級覺悟，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积极投入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五年一月

階級教育讀物

集体經濟展翅高飞

公社結起連心鎖

幸福話儿說不完

苦乐兩重天

血泪話家史

九死一生

洮水村的变迁

工人养肥資本家

五代矿工百年泪

艺徒泪

宁死不屈的解文卿

害人魔王高圣君

大店“庄閻王”

吸血鬼李三黑

統一書号：T 3099·334

定 价： 0.14 元

目 录

- 苦与斗的回忆 崔德錫 (1)
- 五代矿工百年泪 石紹祥 (23)
- 血染煤海 毕玉云 (40)

苦与斗的回忆

洪山煤矿副矿长 崔德錫

淄博市地下埋藏着沉睡万年的煤海。解放后，我們的矿山由于国家拨出大批的資金，生产日新月异地发展，机械化代替了手工操作，煤井下的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我們矿工真正成了矿山的主人，参与了生产计划的討論研究和生产管理。党和国家从各方面关心矿工的劳动和生活，頒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北戴河、青島等地建立了矿工疗养院；矿里增添了許多安全設備，修建了食堂、澡塘、保健站、医院和宿舍。除此以外，党和国家为了关心我們矿工的文化生活，还創辦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設立了劇場、电影队、俱乐部等等。所有这一切，是我們过去連想都不敢想的。和旧社会对比起来，真是天渊之別。旧社会，我們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煤黑子”，受尽了資本家、日本鬼子、包工把头的剝削和压迫，不光忍飢受餓，挨

打受罵，而且世世代代有許多工人弟兄被他們榨干了最后的一滴血汗，又被一脚踢开。在旧社会，我們矿工弟兄們是被囚禁在黑暗、冷酷的人間地獄里。当时流传在工人中的一首歌謠，道出了我們牛馬不如的生活。

井下工人苦难言，
下井如进閻王殿。
干的牛馬活，
吃的猪狗飯。
棍子打，巴掌搨，
拳打脚踢家常飯。
包工把头狗腿子，
喝尽工人血和汗。
年老生病无人問，
流落他乡街头串。

我自己也有这样一段血泪凝成的遭遇。

老輩的苦难

自我祖父起，三代都是矿工。旧社会的鎖鏈使我們一代比一代苦，一代比一代穷。

爷爷从小下窑，穷奔苦爬地干了一辈子，也穷了一辈子，最后只留下了一间破草房和二亩薄山地。

我爹崔文宪十一岁就下窑干工，帮我爷爷分担沉重的生活担子。饥饿、劳累和岩粉的折磨，使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矽肺病。成家后，生活担子更重了。他为了全家人能吃上饭，下窑干活，上坡种地，繁重的劳动压得他经常气喘、咳嗽。在井下拉一趟炭，歇好几次还喘不过气来。资本家见他已无油水可榨，就一脚踢出来。当时他才三十一岁。

家里虽然还有二亩薄山地，但是由于我爹成天下窑，地种得不好，二亩地还打不出一亩地的粮食，全家生活主要还是靠我爹微薄的工资。他一失业，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没吃的怎么办？我娘只好出去要饭；要不出来，她就到穷娘家去要点粮食，掺糠添菜地勉强度日。我爹看到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就拖着病身子去给地主放牛。资本家狠，地主更毒。我爹天蒙蒙亮出去，摸黑回来，两头不见太阳；下雨没有蓑衣，毒日头下没有草笠，整天风吹雨淋、日晒夜露地给地主卖命，连自己也填不饱肚子。地主每天要看一遍牛的肥瘦，却从来没问

我爹一声寒暖、飢飽。这样辛辛苦苦地把地主的牛养肥，自己却被折磨得只剩下一个骨架子。后来，狠心的地主看他瘦成那样，放牛也不行了，就把他赶出来。

我爹在资本家、地主的摧残下，走投无路，连气加愁，病情更加严重了。浑身浮肿，倒在炕上爬不起来。我娘为了给他治病，把仅有的二亩薄山地卖了，到处请医也不管用。又把一个场园卖掉，病还是没治好。急得她整天泪流满面。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我爹才能勉强起床，一家人这才放了心。

地卖了，又不能干工，还拉下了一腔飢荒。家里坛坛罐罐空空的，床上连一张席都没有，我们弟兄几个，都没有衣裳，个个光着腩，真是穷得象沙滩上的石子，光溜溜的。那时，我最大也只有八岁，娘又怀着孕，爹眼看着这种情景，只是捶胸长叹。末后急得没办法，我爹决定再下窑去。娘左说右劝，爹总是不听，眼看着爹摇摇晃晃的身影越走越远，娘的心如刀绞，眼泪顺着腮颊流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她只是为我爹带病挣扎谋生难过，却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下窑，竟成了永别。

爹下窑后，拚着命干活，想多挣一点钱，让孩子们吃顿饱饭，一连干了三个大班（一个大班二十四小时）。累得他喘气的劲都没有了，狠心的把头还逼着他到一个不通风的“迎头”去干活，里面既闷又热，哪里能受得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把头说：“到点了，我要上井，不能再干啦！”毫无人性的把头却恶狠狠地说：“有你下窑干活自由，没有你上窑的自由，只要有口气，你就得给我干！”可怜我三十二岁的爹，就这样被活活闷死在洞子里。

爹一死，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黑心的资本家分文不给，多亏得穷乡邻们送给一张破席，才把尸体包起来埋了。

八岁下矿井

爹死后不久，娘生了个小妹妹。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一个二十九岁的寡妇拉着四个最大还不过八岁的孩子，无依无靠，真难啊！娘不知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她思前想后，觉得眼前的路越走越窄，没有奔头。眼望着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又不能不活下去。为了渡过眼下的困难，她狠了狠心，打谱让我下窑。

那时候下窑虽说是个危险活儿，但是生活无出路的穷人要想在井上找个活干，离开钱和情面也是办不到的。娘为了让我下窑，不知跑了多少腿，求了多少人情，说了多少好话，又借钱送了礼，把头才算勉强答应了。

我第一天下窑，娘心里和刀子割一样，她想起我爹的惨死，眼看着又把我送上了绝路，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淌。天不亮，她就起床，想做点啥给我吃，可怜家里连粒老鼠拉的粮食也没有。天气冷，肚里无饭，怎么行？只好烧了点开水让我喝上，暖暖身子。

我跟着本家的一个叔叔，迎着寒风走了。路上，叔叔知道我还没吃啥，就给我买了一斤煎饼，并耐心地对我说：“到井上，人家问你多大，你就说十五，可不能照实说；要不，就干不成工了。”到了井上，叔叔替我拿了牌子，领了“蛤蟆灯”，灌上油，来到井口。我从小忍饥挨饿，身子骨又矮又弱，加上穿的单薄，看上去显得格外瘦小。把井口的狗腿子横眉竖眼、恶声恶气地问：“你这个小崽子，几岁了？”我小声回答了，他不信，叔叔赶忙补上了一句：“你别看他人小，他是山坡地里的谷子，个儿

小，可有穗（岁）。”那家伙狠狠地又朝我打量了一番，才放我下去。

我和叔叔站在“牛皮罐”里，用木轆轤送下井底。这“牛皮罐”就象泥瓦匠用的泥兜子一样。大人站在铁罐圈上拉着铁环，我长得矮小，够不到铁环，只好站在罐底上，罐底很软，一踏上人就墜下去，没倒净的水，淹到我的腰部，冻得我直哆嗦。井底下黑洞洞的，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一挪动，又掉在“仰井”里，弄得浑身透湿。叔叔把我拉起来领着往里走。巷道又矮又黑，借着“蛤蟆灯”发出的微光，磕磕绊绊地走一会爬一会，爬一会又走一会，不知拐了多少弯才好容易到了窝里（掌子面），累得我腿疼腰痠，满身大汗。还没等我喘过气来，把头就给了我一个比我腰还粗的笕子，要我提水。一笕子水比我还重，又要穿过五十米高低不平的斜坡倒在水沟里。路又滑，井又黑，我一看就害怕了。不提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干。我拚上命每趟只能提动半笕子水，累极了想歇歇，把头看见就打。我拚命地提，窝里的水也总是提不尽。把头路过这儿，看水满了，就得揍我，数不清挨了多少打、多少罵。手提肿了，脚磨破了，我哭着来，哭着去，一直干到第



二天清晨，也哭到第二天清晨。带来的那斤煎餅一动未动，累得我連张嘴吃飯的力气也沒有了。只觉得天旋地轉，記不清是怎么上的井，又怎么回到了家。

娘見我一天一宿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眼泪簌地一下滾下来。她赶忙把我搀扶到炕上，接着把人家送給的一个鸡蛋做了給我吃。她一边喂，一边心疼地哭着說：“孩子！掙飯吃就得受苦，靠下去就好了。”

我真是乏极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刚一起身，觉得渾身象散了架，疼得我一咧嘴。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抽泣着說：“我不能叫你再去受罪，这样早晚得把你折騰死，咱不去下窑了。”生活的磨炼，使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我不去下窑，娘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怎么生活下去呢？我强忍着渾身的疼痛，故意瞪了瞪腿，哄娘說：“娘！你看，我身上不疼了。”娘还能說啥呢，除了这一条路可走外，实在沒有出路，只好含着眼泪讓我去了。

我就这样慢慢靠了下来，但娘的心里却一刻也沒平靜过。她一想到我爹和附近許多工人惨死在井下的遭遇，就心惊肉跳，整天为我担忧。每当我上

了班，她的心就吊起来，直到第二天见我平安无事地回来，心里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这样卖命，每一个大班（二十四小时）挣的工钱只能买五、六斤谷子。家里除了给我做点煎饼吃外，娘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只是吃些拿不成个的糠窝窝或只见野菜不见粮食的稀粘粥。

我当了五个月“水伙”，在矾水里泡了五个月，两脚烂得净是口子。在井下矾水里泡着，还能忍着疼干活。一上井见了风，皮开肉裂，鲜血顺着裂口直流，走起路来象踏在刀尖上一样。最初，我怕娘知道难过，就用点破布缠住脚，一步一咬牙地来回走。后来厉害了，一动就出血，有的地方烂得可以看见骨头，疼得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四肢着地往家爬。有一次，七点钟上窑，十二点了，才爬出三里多路。多亏同村的一个老大娘看见了，告诉我娘，娘才哭着把我背回家。

从此，娘天天背着我上班。当时，女人是不能到井口去的，资本家认为女人会“沾污了井筒”，给他“冲走财神”。娘背着我，离井口老远就得把我放下，再让我爬一段路；爬还不能让把头看见，到井口跟得忍疼站起来直挺挺地走，不然，就要砸掉饭

碗。不管是风里雨里，娘背着我上班，又背着我回家，她脚小体弱，不知受了多少劳累！

工人吃苦受罪，根本动不着资本家、把头的心。他们光知道伸着两只黑手死命地剥削工人，克扣工资是家常便饭，逢年过节还要逼着工人给他送礼。如果谁不给他们送礼，随便给安个罪名，就被一脚踢出来。我干了三年，每逢春节、五月端阳、八月中秋、把头家大人小孩的生日，都得一家人饿着肚子不吃不用，省出钱来买上酒、肉和香烟送礼。

又一个春节到来了。这年，我十一岁，三年的磨炼，已顶个大人干活，可是还拿童工的工资。我恨透了资本家、把头这些黑心狼，心想：“为他们卖了三年命，流了多少血汗还是给我一半工钱，逢年过节送礼可得送整份。今年春节，我不花这份冤枉钱了，看你们咋着。”没有人心的把头，是认钱不认人的，由于我没送礼，腊月底就真的把我踢开了。

討 飯

一家人唯一的饭碗，被狠心的把头砸碎了。

除夕晚上，有錢人家爆竹連天响，魚肉滿桌香，小孩子也換上新衣裳，高兴得乱跳乱嚷。我家里却清鍋冷灶，淒淒慘慘。不要說魚肉，連下鍋的糧食都沒有，娘懷抱着小妹妹，看着冻餓得縮成一团的几个大孩子，眼淚汪汪，沒有一點办法。我經過几年的摔打已經懂些事了，就說：“娘！別难过，等俺兄弟長大，日子就好過了。把头不讓我下窖，想餓死咱，咱還等着餓死？不如去要飯吧！”

娘想了想，眼下只有走這條路。她找出几塊破布，东拼西湊地縫了兩個要飯袋子。大年初一，天剛放亮，我一家五口，拖着又冷又餓的身子，鎖上門，出了庄。

我們分成兩伙，娘領着小弟弟和小妹妹，我和二弟一伙，分頭去要飯。那時我二弟不到十歲，由于又累又餓，走得慢，不能按時回家，娘整日擔心害怕。一天，我和二弟跑了井桐、蓼塢、佛村三個庄子，都沒要飽。時近黃昏，天氣又冷，破衣爛絮的怎么能擋住這刺骨的风寒？冻餓得我兄弟倆頭暈眼花，渾身打戰戰，怎么也跑不動了。天漸漸黑下來，我想起了娘的話，“天黑一定要趕回家”，便鼓起勁兒，架着弟弟往前擲。兄弟倆走一會，歇一

会，天完全黑了，沒有月亮，沒有星光，一陣陣凜冽的山风，一陣陣餓狼嗥叫，荒山沟的黑夜，显得格外淒涼恐怖，象要把我們这对苦难的小兄弟吞噬掉。最后，还是娘把我們找回家。

俺娘儿几个，不分五冬六夏，不管雨淋雪打，整天跑东庄、串西庄地流浪，还是要不飽肚子。穷人想給，沒啥給，只是碰到收割季节，他們才能給点，有时还管你一頓飯。財主們心腸狠，他們有东西不肯給，还放出狗来伤人。罗家庄有一个姓梁的地主，养了五条大狗，一听到要飯的喊声，就一齐扑出来。一次，我二弟的小腿被他家的狗咬得鮮血直流，躺在地上哭。这时留着八字小胡，穿着馬褂的地主，提着文明棍走出来，不耐煩地說：“小穷鬼，在这里哭啥！还不快滾！”狗咬着人的事他却只字不提。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啊，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一个好东西！

斗 爭

要了三年飯，我十四岁了，这时日本鬼子占据了矿山，我們的日子更难过了，从清早到日落跑遍了好几个庄，也要不飽肚子。我觉得要飯总不是长

法，便和娘商量，又到沈馬庄二坑下窑拉筐。我两个弟弟也在苦水里泡火，他俩都在十一岁时下窑当了“筐头”。三个人下窑，才勉强糊住全家五张口，总算结束了要飯生活。

拉炭是件重活，当时在“筐头”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

披着四两麻，
拉着一筐炭，
汗水淌一班，
吃不上一頓飯。

这足以說明当时拉筐工人的苦楚。对我们十多岁的孩子來說，更是苦上加苦。一筐炭比我们身体还重，豁上命才能拉动，干上一个大班，弄得精疲力尽，累了想歇歇，把头看見就打。这些家伙是“筐头”的死对头，工人们个个恨之入骨。大伙虽然不敢明着和他們斗，却經常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来对付。把头来了，干一陣，把头一走就“磨洋工”。我下过三年窑，知道长眼色行事；二弟憨直，不管什么場合，累了就歇，歇着就睡，老是挨把头的棍子，經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三弟在井下累得也常睡觉，也

被把头发现过，但是他人小机灵，把头往往周旋不过他。

在这些封建把头中，最坏的是王泰子和陈秃子。他们都是日本鬼子和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倚仗着他们主子的势力，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对付工人的办法又多、又狠，打骂工人和家常便饭一样。工人偶有反抗，就会遭到更为毒辣的拷打或开除，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因此工人恨透了他们。

一九四二年，我十九岁了，对当时的社会和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愤愤不平，但除了表现一些不满的情绪外，总是找不到对付的好办法。这时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在矿工中进行阶级启蒙教育。在党的教育下，我的思想开了窍，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使我懂得了：只要大伙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齐来对付日本鬼子、资本家、把头，他们就不敢打咱们了。从这以后，我们一有机会，就和敌人进行斗争。

一天，把头王泰子又神气活现地坐在断层上崖，监视工人劳动。工人拉着筐来到这里，有事无事的他都要骂几句，工人们都气火了，合计着要治

治这个家伙，煞煞他的威风。在大伙的支持下，我拉了一筐块煤冲他去了。还没到跟前，这家伙就骂开了，这更给我火上加油，我使足力气，猛向王泰子冲去。这家伙光顾骂人，没提防，一下子被我冲到下崖去了，一筐块煤也随着呼呼隆隆地滚下去，砸得他象条受了伤的野兽一样的嚎叫。王泰子半天才一瘸一瘸地爬上来，只见他鼻青脸肿满脸煤粉。他没好气地问是谁干的事，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这家伙见工人多，知道没有便宜赚，便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看到他这副狼狈相，井下扬起了哄堂的大笑声。

又一次，我和四五个工人在山头一坑干活，我们早早地把规定的活干完了。把头陈秃子见天时还早，要我们再干。我们见他不讲理，就和他对骂起来。事后大家一合计，得罪了把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早晚会给我们暗亏吃，大伙就商量着教训教训他。上井后，我们便到陈秃子住的庄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等着陈秃子。十点多钟，陈秃子大摇大摆地来了，我们都摩拳擦掌地等候着。陈秃子远远地看到这个阵势，脚步放慢了，距离好几米远，他就站下来，强堆起笑脸张口结舌地说：“今天是兄弟



的不是，我对不住你们，我发了疯，今后我绝对不再多事了。”

我们看他这副奴才相，心里又气又恨，就警告他说：“陈秃子，你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鬼子那么尽忠尽孝，对我们工人那么狠。要是以后再敢随便欺侮工人，下一次可不饶你！”

陈秃子连连告饶：“再也不了，再也不了！”打这以后，他表面上是显得老实多了。

不久，我当了拥车工。这里的把头，还没领教过工人的“厉害”，气焰还很嚣张，动不动就打骂工人。我就和开绞车的表弟杨光训商量办法出气，俺俩商议，闹就闹大的，于是决定破坏绞车。这天，当绞车放车时，杨光训故意不用掣，让它飞快地滑下，随着将把手猛向左一扳，来了个急刹车。“喀嚓”一声，轴心的齿轮裂为两半，绞车瘫痪了。为了不露马脚，我们在崭新的裂口处涂上矾水，破铁碴遇见矾水，立时起了一层黄锈，乍看上去象原来就有裂碴一样，就这样瞒过了日本鬼子。十二个小时没有出炭，工人们总算出了一口气。

我在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启发下，又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偷了敌人不

算儉”的口号下，我和其他工人一起，“儉”敌人的煤、电石等来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团结了广大工人兄弟，破坏敌人的生产。

一九四五年八月，驕横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淄博地区第一次得到解放。这时，我已是二十二岁。这年十月，党把我送到淄博矿区工会举办的訓練班学习。在这座紅色的革命熔炉里，我进一步懂得了工人受压迫、受剝削、要革命的道理，心里更加亮堂了。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周围的工人，进一步和敌人展开了斗争。

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蔣家王朝的末日来到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反动派向南逃窜，淄博市获得了最后的解放。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投入了矿山的恢复和建設。不久，矿山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我和广大工人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封建把头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和清算了把头的罪恶，几百年来沉重地拴在矿工脖子上的鎖鏈——封建把头制度，被彻底砸碎了。我們这些在旧社会牛

馬不如的“煤黑子”，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搬掉这块沉重的大石头——封建把头制度，我觉得浑身轻松，在这欢乐的日子里，我生产的劲头越来越高。由于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太差，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但党总是在不断地鼓励我、支持我。

解放初期，采煤方法仍是沿用落后的残柱式采煤，劳动强度大，产量低，远远不能适应祖国建设发展的需要。一九五〇年，矿山掀起了技术改革热潮，上级提出要推广长壁式采煤经验。这个方法试验成功，就能使用机器，增加产量，并能节约大量的劳动力。由于受旧习惯的影响，当时我们思想不通，不相信长壁式采煤方法。党及时地教育我帮助我，指出矿山的发展前途，指出煤炭工业技术革命的方向。当我和工人弟兄们第一次试验失败后，党和领导又及时帮助我们总结失败的教训。在党的鼓励下，我和工人们又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第二次试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后终于获得成功，打开了试验长壁式采煤的第一个难关。接着推广使用了采煤机器。这一年我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

生产技术的革新，使生产水平不断地上升。采

煤、運輸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撤柱子效率很低，成了障礙生產的關鍵。當時木柱是直接靠在底板上，上下頂得死死的，很不好撤。我和工人們一塊研究，想出了木柱墊木座的辦法。當我向工程師提出這項建議時，工程師說：“木座承擔壓力小，支不住垮了面怎麼辦？……將來計劃用鐵座子”。我和工人們一合計：鐵座子還沒計劃製造，最快也得一二年，不能坐等呀；再說，如能用木座代替，不是能為國家節約一部分鋼鐵嗎？後來我向黨委談了我們這個意見，領導很支持這個建議。從此，我無論走路、吃飯，無論白天黑夜，總是反復考慮這個問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終於試驗成功了，提高了撤柱效率。直到現在，井下支頂板的木柱下邊還是使用的木座子。

解放後，我先後擔任了采煤隊長、井長，一九五三年又擔任了洪山煤礦副礦長。一九五四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接參與管理國家大事。這些年來，我曾十次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好幾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每次接見代表，和我握手時，我總是激動得兩眼噙滿着淚水，連聲地問着：“毛主席您好！”

我从八岁下窑，在旧社会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那痛苦和仇恨深深地烙在我心坎上，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旧社会，我辛辛苦苦的劳动，但换来的是饥饿、寒冷，是日本鬼子、资本家和把头的毒打、白眼；在新社会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但党和工人弟兄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和信任。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一个普通矿工培养提拔到今天的地位。我的幸福和荣誉都应该归功于党的英明领导。看看今天，想想过去，更使我体会到党的光荣、正确、伟大。

现在我的家庭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旧社会熬过来的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壮，正在愉快地度着晚年；二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来洪山煤矿当了机电工；三弟现在是洪山煤矿干部科长，全家二十五口人有吃有穿有住。母亲常感动地说：“过去三个下窑的养俺娘俩（娘和妹妹）都养不起，现在还是三个人在矿上干工，养俺二十五口人还有剩余。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靠山！”她经常教育我们弟兄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中共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淄博分公司政治部整理

五代矿工百年泪

夏庄煤矿采煤队长 石紹祥

我的家是淄博市博山区安上村。在安上村周围几十里，到处是煤田。这些丰富的宝藏，解放前曾先后被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者霸占着。据说，这里在四、五百年前就开始采煤了，几百年来，这些吸血鬼们不知掠夺了我们多少财富，榨取了我们矿工多少血汗，残害了我们多少生命。我家五代在旧社会的遭遇，就是我们广大矿工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

为地主资本家卖命

我家究竟从哪一代开始下窑，现在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了，老人们只记得，我高祖父石在禹是个下窑的。就从高祖算起，到我这一代，一百多年，祖孙五代，有十七条硬汉子下窑当矿工。五代矿工，一代比一代穷，一代比一代苦。有的惨死井下，有

的伤残以后穷困而死，直到解放，俺这一家才算逃出了苦海，我们劳动人民才成了矿山的主人。

我高祖父那时候，家里只有二亩薄山地，农忙时给地主家打短工，当冤汉，秋后就到财主家开办的小煤窑上去干工。就这样夏秋扛锄头，冬春下煤窑，一年到头拚死拚活地干，一家四、五口人还是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过着穷苦的生活。

那时的小煤窑是土法开采，技术非常落后，井下的条件坏到了极点。煤层不到半米高，人只能蹣缩在里面侧身卧倒用手镐刨煤。巷道低矮，运煤工拖着一百二十斤重的筐，只能用四肢在泥里水里来



回爬行。井下的空气又稀薄，又污浊，一动弹就浑身冒汗。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一干就是二十四小时，不用說人，就是牛馬也受不了。我高祖父石在禹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拚死拚活地拉煤筐，一直拉了很多年，结果是开煤窑的财主发了财，我高祖父一家还是受冻挨餓。他老人家干到四十多岁，就被折磨得得了痲病，离开了人世。这就是我家第一代矿工的悲惨遭遇。

曾祖父的遺囑

我曾祖父，弟兄四个，都是八、九岁就下窑干工，到了壮年，四条硬汉子拚命干，一家的生活并没有比高祖父那时候好一点点。他们弟兄四个，有两个穷得断絕了后代；寿命最长的也只活到四十多岁。

我三曾祖父石桂林从九岁下窑，干到三十五岁时，在井下砸伤了腰和腿。矿上不但不給治伤，反倒一脚踢开不要了，结果成了个弯腰瘸腿的残废人，只好沿街討飯。后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冻死在庄头上了。他到死还是个穷光棍。

我四曾祖父石成林，干到三十多岁就被折磨得

得了重病，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了，靠他的独生子討飯养活他。这样苦熬了半年多就死了。他死以后，他儿子不愿再干矿工，就外出逃荒，至今沒有音信。

我曾祖父石金林，也因为是在井下受折磨，四十多岁就得了重病。他根据自己一家两代五个矿工的亲身经历，根据广大矿工的悲惨遭遇，决心不叫他的七个儿子再到井下受折磨。他在临死的时候，流着泪对我爷爷說：“学友啊！你們往后……只要有一綫之路……也別下窑……咱不給財主們卖命啦！”

还得走那条路

曾祖父临死时虽然囑咐我爷爷不要再下窑給地主、資本家卖命，可是，那时候的天下是反动派的，沒有組織沒有领导的工人，怎么能夠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我爷爷弟兄七个，虽然牢牢地記住了我曾祖父的囑咐，可是他們为生活所逼，还是不得不下煤窑，干矿工，走上两輩人已經陷下去的那条路。我爷爷这一代七个矿工的遭遇，比上两代更悲惨。

我爷爷石学友是长子，曾祖父死后，十几口人

的家庭負擔就落在我幼年的爷爷的肩上，他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就下窑当“水伙”。为了多挣几个錢，他在井下什么活重干什么，三十九岁就被折磨得臥床不起了。为了給爷爷治病，奶奶瞞着爷爷典掉了祖传下来的那間破草房。到給买主騰房时，爷爷知道了，疼得心慌肉跳，不久就死了。

二爷爷石学富也是三十多岁就被折磨得得了一身病，被資本家赶了出来。为了給二爷爷治病，卖掉了仅有的一点破房子。后来二爷爷的病沒治好，一家人連个住的地方也沒有了，不得不借地主石在庚的場园屋住。狠心的地主还想在这苦难人的身上榨出四两油来，提出要想住他的場园屋也不难，必須做豆腐卖，带着給他养猪才答应。二爷爷为了有个栖身之地，只好带着重病，夜里做豆腐，白天串乡卖，掙扎了五、六年就不能动了。地主看到再也榨不出油水，馬上把他一家赶了出来。二爷爷病上加气，不久就死了。撇下二奶奶沒法生活，只得領着儿女出外逃荒要飯。母子三人討飯也討不飽肚子，为了減少一张口，也是为了叫女儿逃个活命，二奶奶忍着割心的疼痛卖掉了亲生女儿，剩下母子俩繼續討飯。

三爷爷石学朋，身材高大，力气过人。资本家看到有油水可榨，便抓住不放，要三爷爷在他煤窑里卖命。后来三爷爷在五亩地井下砸断了腿，资本家张顺清沉着个脸说：“砸着谁谁倒霉！”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走开了。和三爷爷一块下窑的工人们一看黑心的资本家推开不管了，就凑了点钱，把我三爷爷抬到日本人开办的东和医院去治。谁知一个满脸横肉日本鬼子不给上止疼药，就把腿锯下来了，疼得我三爷爷当时就昏了过去。加上流血过多，不几天，他老人家就活活疼死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就是这样草菅矿工的性命。

四爷爷石学旺下井几十年，煤粉和岩粉毁坏了他的健康，四十多岁上得了痲病，咳嗽起来象抽风一样，后来活活闷死了。

我六爷爷石学福是下窑时断了绳摔死的。只有五爷爷石学栋和七爷爷石学昌算是侥幸熬到解放，没死在资本家的煤窑里。可是我五爷爷十五岁的独生子石志武，为了多挣几个钱给我五爷爷治伤，腊月三十下窑打连班，被砸死在资本家的煤窑里。我五爷爷闻信后，拖着重伤的腿，跑到煤窑上，抱着他儿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可是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只顧花天酒地欢欢乐乐的过年，哪里顧得工人的死活。反而說在年关死，在年关哭，冲散了他的福气，把我五爷爷撵出了煤窑！

我爷爷弟兄七个干矿工，被资本家吃掉了五个，五爷爷还被吃掉了独生子。这就是我家第三代矿工的遭遇。

我家前三代十二个人干矿工，除了两个人熬到解放，其余十个人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就被资本家、地主折磨死了。他們的遭遇为什么都这样悲惨呢？资本家的一句話道破了其中的秘密：“要出炭，拿命换！”这是煤矿资本家的生意經。他們获得的惊人利潤，是拿咱老几代工人的命换来的，资本家手里的每一分錢，都沾滿了工人的鮮血！

父亲的悲惨遭遇

我父亲石志斌这一代——我家第四代矿工的命运就更苦了。

我爷爷死的那年，我父亲才十三岁。他和我爷爷一样，在童年时代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那时我家有六口人，祖母、三个姑姑、一个叔叔和我父

亲。为生活所逼，我父亲在十四岁就下窑当了“水伙”。那时候，他还没有他擻水的柳条筲子粗，却要按照资本家的规定，一个大班（二十四个小时）擻一万多筲子水。要连着擻一万多筲子，不用说一个童工，就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也能够受的。可是资本家和把头不管你童工不童工，擻不够数不准上井，还要挨打、挨骂、扣工资。我父亲只好赤身裸体泡在矾水里拚命地擻水。脚被矾水泡烂了，咬着牙忍着疼也得干。这样拚命干上二十四小时，得到的钱只能买三、四斤粗粮。这点东西一家人当然吃不饱，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拿起要饭棍去要饭。到我叔叔下了窑，甚至到我父亲和叔叔两个年轻力壮的矿工一齐下窑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还是吃不上饭，娘常常领着我和弟弟沿门乞讨。

有一次实在饿得没法忍受了，我父亲去找把头要工钱，不仅不给反而被他们臭骂一顿。又听说一家地主向外借粮，春借半斗高粱，秋还半斗玉米。我父亲去借，又挨了地主一顿骂：“你能还得起吗！什么时候还？想吃我的粮食，你是做梦！”在这苦难的年月里，我三姑和我奶奶都是活活饿死的。我奶奶临死的时候，眼泪汪汪地对我姑说：“我是快

……快入土的人了，要是能吃上頓……白煎餅，也算這輩子沒……沒白活。”這可難壞了全家，後來求東告西，好歹借來了一張白煎餅，等我二奶奶拿着白煎餅跑進門來的時候，奶奶已經咽了最後一口氣。奶奶！奶奶！你苦了一輩子，連張白煎餅也沒吃上啊！

一九三七年，國民黨反動派打着“抗日救國”的旗號來搜刮人民，實行“防共剿共”的陰謀，家家要一名壯丁，戶戶要兩塊銀圓。一天，偽閭長趙繼生對我父親說：“石志斌，你兄弟兩個得出一個壯丁！”我父親說：“你也兄弟倆，我也兄弟倆，要去都去。”偽閭長把臉一翻說：“你敢抗丁不出！好，咱到縣里去說說。”那時候衙門是人家的，到縣里哪有咱的理說。母親認為偽閭長趙繼生是她娘家的本家叔叔，就跑到他家去求情賠禮。剝削階級、反動派只認得錢，哪里認親，非叫俺家擺酒席不可。一擺酒席，花錢就沒數了。後來好說歹說，送給偽閭長二十塊現大洋，才免了這場災禍。

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淄博以後，礦工們受的剝削統治更重了，除了在井下干工以外，還得給日本鬼子、漢奸站崗、放哨、修炮樓、看鐵路等。我父親

被抓去看鐵路，因為打瞌睡，不知挨了他們多少打罵，有時打得腿都走不動。有一天，兩個漢奸闖進俺家，硬說俺爹偷了他的管子，五花大綁綁起來就拖走了。

我父親遭受的折磨，比他的上几代還殘酷，也是不到四十歲就得了癆病，高祖、曾祖和祖父的下場正在等着他。一九四八年，俺這一家，不，咱淄博全體礦工正在沿着老几輩礦工的悲慘命運向下陷的時候，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淄博，才救出了俺一家的生命。

我也吃過舊社會的苦

我今年雖然只有三十歲，解放那年我才十三歲，可是我也吃過舊社會的苦，知道舊社會是啥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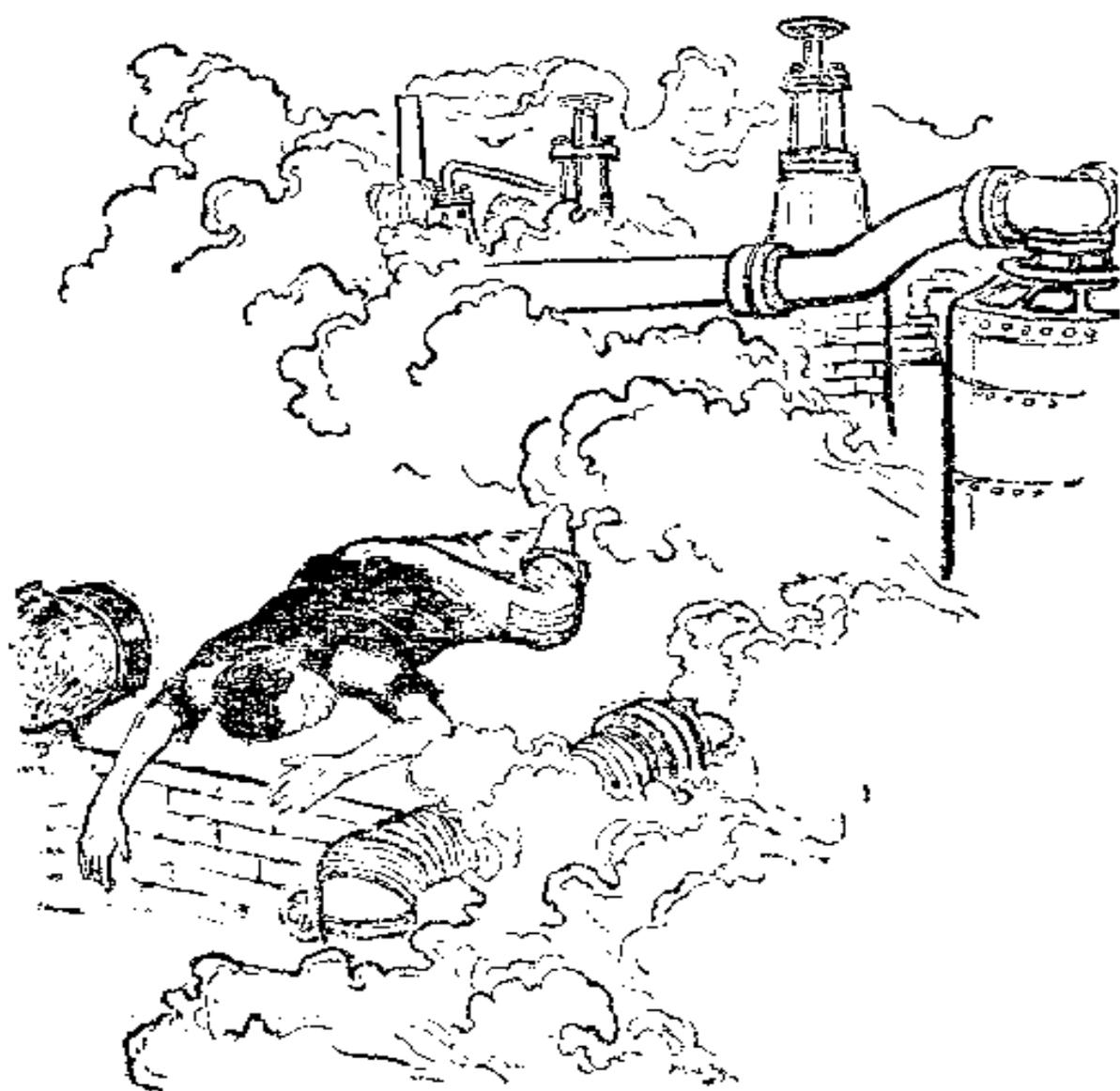
解放以前，我不記得穿過一件新衣，吃過一頓飽飯。那時俺家人口不算多，俺娘總是在一個鍋里做三樣飯：先少摻點糠菜給俺爹做一份，再加些糠菜給我和小妹妹做一份，最後俺娘那一份，就幾乎淨是糠菜了。吃飯的時候，誰也不肯吃那一份糠菜少的，你推給我，我推給你，但是誰也吃不飽。生

活实在困难，逼得我五岁就去讨饭。

八岁那年夏天，听说煤窑上要小孩刷锅炉，我高兴极了，找个活干干，挣点钱也好减少爹娘的忧愁，便托人说合干上了小工。

夏天鑽到锅炉里干活真不是滋味，活象鑽进蒸籠里一样。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小伙伴轮流进去刷。有一回，我在锅炉里干了一阵子，就出来站在锅炉上提水渣。人小，活累，又热，又餓，只觉得眼前发黑，金星乱冒，一下子就昏过去了。清醒过来以后，觉得脊梁上火辣辣的疼。原来在我晕倒时碰到灼热的热气管子上，粘下来一块块皮肉，烫起了一串串水泡。当时怕资本家不要了，忍着鑽心的疼痛繼續干；回家怕娘心疼也沒說，咬着牙又干了一班。到了夜里，身上发高烧，烧得胡言乱語，母亲才发现我脊梁烂糊糊的。这次烫伤一直靠了四十多天才好。

一九四三年淄博大旱，穷人家断炊，要飯也沒門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妹妹脖子上又长了疮。嘴还顧不上，哪有錢治病！我一看爹娘愁得那个样，就要去下窑。曾祖父临死嘱咐的話，俺家几輩都沒有忘記，俺爹娘哪肯讓八岁的孩子下窑！后



来实在撑不住了，又加上我苦苦哀求，才答应我跟爹下窑当了小“筐头”。

开始，爹帮着我，还给我筐里少装点儿。后来把头知道了，逼着我自己拉，还得拉满筐。一筐炭一百多斤，十来岁的孩子怎么拉得动呢？拉不动也

得拉，筐不滿不算數不說，還要挨打。記得在張家壩下窟，有一回把頭叫我从“上山”往下拉，那地方坡度很大，最陡的一段有小三十度。常年挨餓，本來就沒勁，从上往下放一筐比我还重得多的炭，怎么能干得了呢！一到这段路，我就吓得打哆嗦。記不清是第几趟上，到了这个鬼地方，簡直一点劲儿也沒有了。剛要往下滑，覺着那筐炭象座大山似的压下来了。我知道坏了事，但是已經无法控制，連人帶筐一齐滾了下去，連砸帶磕，弄得鼻青脸肿，滿身是伤，差一点丧了命。我定了定神，爬起来，把炭收在筐里，把頭見筐不滿，破口大罵着就来打我。我吓得忙跑到爹那里去了。爹赶快拉了一筐炭頂上，又向把頭講了几句好話，我才脫了这頓毒打。至于我摔的那一身創伤，只好自己忍受了。

在这鬼地方实在受不了，爹就帶我到洪山去下窟。去的时候正是夏天，太阳把地面晒得象盘热鏊子。穷得連飯还吃不上，哪里去弄鞋穿，我的两只脚被烙得又紅又肿。实在走不动了，爹就背着我走。爹常年挨餓，也是有气无力的，背着我走不几步就喘粗气，冒大汗。我在爹背上，比自己走心里还难受。

到了洪山，我們同样是出牛馬力，吃猪狗食，每班干二十四小时，一頓飯只給俺爹两个掺菜的高粱窝窝头，連点咸菜也沒有。我年紀小，活又累，累得吃不下去，拿着窝窝头光掉泪。爹怕我折磨坏了，就托人把我偷偷送回家来。在洪山只呆了一个多月就把我折磨病了，到家不久，鼻口出血，就倒在炕上起不来了。

小妹妹的疮，这时更厉害了。我們两个人都病在床上，沒錢治病，也沒米下鍋。掙，掙不来，借，借不到，只好一天一天的挨着等。

小妹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恶疮折磨得她吃不下糠飯菜团，瘦得皮包着骨头。但她看到爹娘的困难，总是忍着疼，耐着餓，从来不吵不鬧。有一回，娘領她到俺四奶奶家去，四奶奶給了她一个煎餅。她刚吃完，娘就領她走了。走出四奶奶的門，小妹妹問：“娘，你怎么領我走呢？咱不走，四奶奶会再給一个吃。”俺娘难过地說：“你四奶奶那点儿粮食是刚用你小姑换来的。”小妹妹虽然年紀小，穷人家卖儿卖女的苦楚，她却看到过很多。从此，她再也不吃四奶奶給的东西了。

到秋天，小妹妹的疮更厉害了，我的病也不見

好。姥姥来看俺俩，带了点咸菜来。那时候，俺家连盐也买不起，一听说姥姥拿来咸菜，真巴不得赶快吃两口。可是小妹妹不要，直等到吃饭的时候，娘给她点儿，她才吃了口。

那天，她跟着姥姥在屋里、天井里转，晚上，她还走到我的炕前来看我。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上什么东西了，却还和往常一样，瞪着一对乌黑明亮的眼睛，不声不响，那么安详，那么可爱。就在这天夜里，她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她刚满七岁。这是我家被旧社会吃掉的最后一个人。

从奴隶变成国家主人

妹妹一死，娘疼得病倒了；不到四十岁的父亲，也因饥饿、劳累的折磨患了痲病；我的病越来越重，一家人正在死亡面前挣扎的时候，淄博市解放了。我家从资本家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我的病好了以后，就到夏庄煤矿当了采煤工。我到矿上一看，矿山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家、把头不敢打人骂人了，党办的事情，件件都办到我的心里。我逐渐认识到，矿山是国家的、人民的，我是国家的、矿山的主人。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下，我們矿工才能过人的生活。我常默默地說：“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永远听党的話。”因此，我在生产劳动中总想尽上最大的力量，叫干啥就干啥，事事跑在前头。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一九五三年被評为矿里的劳动模范，一九五五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被提为采煤队长，一九五九年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从一九五六年起我曾五次到过北京，先后参加了国庆十周年观礼，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全国民兵代表会和全国青工代表会。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的时候，我总是抑制着激动的热泪，心里默默地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是你把我們从地獄里救出来，又领导我們走上了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我一定按照你指示的光明大道革命到底。”

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党对我的教育和鼓舞，想起我家祖孙五代的悲惨经历。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吃过剝削阶级的苦头，知道被剝削、被压迫是个啥滋味。为了使自己 and 子孙永

远不忘阶级苦，永远不忘俺家祖孙五代的血泪仇，我们把全家六口盖过二十年的一床破被子，高祖父、曾祖父提着下窑的“蛤蟆灯”，俺娘的要饭筐，一件一件，要永远保存下去。俺家五代矿工的經歷，也要不厌其烦地講給俺的后代听，讓他們懂得剝削阶级的压迫是什么，使他們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永不变質。

中共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淄博分公司政治部整理

血染煤海

协庄煤矿老工人 毕玉云

我的老家是淄博市博山区山王庄。我三岁那年，遍地蝗虫把庄稼啃得净光。穷苦人，家家断炊，户户关门，拖儿带女出外逃荒。在这个节骨眼上，长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又被地主赶出了大门。父亲含愤上吊自杀，母亲只好领着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去逃荒，沿门挨户讨饭过日子。天黑了，我们不是伴着破庙凄惨的钟声渡过漫长的黑夜，就是躲进人家麦秸垛里吞声饮泣苦熬到天明。讨饭的第一年，不到一岁的妹妹在风雪中饿死了；第二年的夏天，哥哥吃多了蝗虫，得了病残废了；第三年母亲忍着挖肉似的痛苦，将十二岁的大姐，八岁的二姐，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我的一家就这样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拆散了。

走投无路下煤窑

餐风飲露到了十一岁。这年，一个陌生人要我去煤井里当刮水工。他說得天花乱墜，什么“吃了饅头拿洋錢，刮起水来賽神仙”，什么“按时上班下班不挂零，娃娃‘水伙’干活多少不要紧”，把我說得心里乐开了花。我高兴地对他說：“我去，我这就跟你走好么？”娘也在旁边給我說好話：“这孩子就是身子骨单薄点，可听话哩！”

就这样，我当上了矿工。第一次下矿井，我跟着大伙，鑽进了一些象老鼠窟窿的煤洞子，爬爬走走，不知拐了多少弯，才到了“迎头”。把头“大洋馬”交給我一把瓢一个桶，橫眉豎眼地对我說：“看到沒有，就这样干，不准偷懶。”接着用鞭子在我头上晃了晃說：“小心，这玩艺儿不認人。”我赶忙提着水桶，学着老工人的架势，一瓢瓢朝里装。可是一桶水比我身体还重，我根本提不起，只好半桶半桶地提。不到半年，“大洋馬”就要我刮七个“迎头”的水。七个“迎头”相距一百多米，这里的水沒刮尽，那里的水又滿了。一天到晚別說歇歇，連伸腰喘气的机会都沒有。这样豁上命干活，还是短不了挨打。

把头“大洋馬”是个豺狼成性的人，他叫一声，你要不馬上赶到，他就想尽坏主意折磨你。有一次，他要我給他倒尿壺，我跑慢了一步，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撂倒在地上，硬逼着我給他把尿喝干。我拚命地捂着嘴，他拳打脚踢，打得我滿口是血，右臂脫肘，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

提起刮水工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从十一岁到十四岁，提了四年刮水桶，几乎沒有一天不挨罵，沒有一天不挨打，沒有一天不流眼泪，沒有一天身上断过痛，沒有一天我的生命不是泡在黃連水里。我放下的是討飯棍，提起的是要命桶。我提过的每一桶水里，都渗透着我的眼泪和鮮血。

背上“坑人筐”

一九二六年的初秋，我放下要命桶去拉筐。一縷新的希望在我脑子里活跃着：“大洋馬”的鉄蹄可再也踏不着我了。哪知道高兴得太早了，丢下了要命桶，又背上了“坑人筐”。旧社会“天下烏鴉一般黑”，“大洋馬”刻薄，管拉筐的大把头康連成更残暴。提起他，人們就咬牙切齿。在井下，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說一个班拉六十筐，你不敢拉五十九

筐。拉不完就打，打完了再拉，什么时候拉完，什么时候上窑。工人都叫他康老虎。有一次我肚子痛得直不起腰来，趴在筐上歇了一会，小把头司繼胜走过来，把我拖到康老虎面前，一个喊杀，一个递刀，把我摔在地下踢打着玩。

康老虎踢一脚问一声：“穷鬼！到底是真痛还是假痛。”

“康先生，我是真痛！”我哀求说。

“啊！真痛，我会治。”残暴的康老虎，双脚朝我肚子上一站，开心地说：“唉呀，穷鬼！我的脚告诉我，说你害的是‘羊毛疹子’，是‘羊毛疹子’就得挑。”

说挑就挑，他拿起弯针恶狠狠地在我脊梁上、肚子上乱扎一气，痛得我象滚油锅似的，拚命地打滚。鲜血染红了煤块，沾满了他的双手。为了不让他们再折磨我，我忍着钻心的痛苦说：“我好了，我能拉炭了，你们放了我吧！”

“真的能拉炭了吗？”康老虎狞笑道。

“真的能拉了。”

“嘿嘿，这玩艺儿真有效。”康老虎带着吃人后的凶相，夹着尾巴跑了。

我吞咽着眼泪，又背上了坑人筐，一步一滴血，一步一行泪，忍着伤痛，拉了四天四夜，才拉完了康老虎规定的六十筐炭，也拉去了我半条命。穷兄弟們含着泪水把我扶上来时，我已奄奄一息，不知东西南北了。

狼心狗肺人面兽

我在华东公司（现在的双山煤矿）当支柱工的时候，有一天正是端午前夕，资本家朱耀如房里，彻夜灯火通明，肉山酒海，猜拳行令。席终饭罢，又叫来妓女取乐。正在这个时候，井下忽然塌了顶板，我的腿被砸断了，膝盖骨碎成了三块。大伙儿把我抬到朱耀如房前，要求朱耀如给点钱，找医生治疗。这时朱耀如酒醉饭饱，正在睡大觉。他的狗腿子说：“朱先生有事，你们先把他抬回家去吧。”胳膊擰不过大腿，穷兄弟們憋着满腔怒火，把我抬回了家。

母亲看着我那根筋吊着的血腿，好象晴天一声霹靂，撕碎了她的心。她想烧口稀饭给我喝喝，可是家里穷得连老鼠拖的粮都没有一粒，只好把我安排在地铺上躺下，领着残废的哥哥去要饭，讨着稀



的她們喝，要到干的留給我。

三个月后，我的腿烂了，人还没有进门，就闻到一股熏人的脓臭味。母亲好不容易给我找了个专治跌打损伤的医生，人家一不要手术钱，二不要车马费，只要几个钱的药费。可是咱拿不出一分一文。穷哥们领着母亲去找朱耀如。这个狼心狗肺的人面兽气势汹汹地说：“井下天天有人死，死一个要一个的钱，我哪有这么多！我又不是铸钱炉。”说罢，把我母亲轟了出来。穷兄弟们不忍看我死去，你一个，他两个，帮帮凑凑，好歹凑了几个钱的药

費，幫我治好了腿。

春去秋來，五年過去了。一天，我們剛下班回來，一個穿長袍戴禮帽的“好心人”對我們說：“伙計們，跟我去吃饅頭吧。”

老實人聽老實話，把棒槌當了針。我高興地問道：“在什麼地方呀？”

那傢伙把油嘴巴湊近我的耳邊神秘地說：“萊蕪洪溝煤礦，那兒拉一班炭發十個饅頭，另給三吊錢。”管他娘的賺錢不賺錢，賺個肚兒圓也是好的。我們一伙七八個，到了洪溝煤礦。誰知道一進去，就象鳥兒關進了籠，再也得不到自由了。剛去的兩天，干一班還發兩個饅頭，以後就光吃橡子面窩窩頭。干了十個班，還不開一個錢。我們問資本家啥時候開錢，資本家今日許明日，明日許後日，六十個明日過去了，資本家還是一個錢不開。我們又問：“你到底啥時候開錢？”資本家這回答復得更干脆了：“多啗老了井（淹了水不能挖煤叫老井），多啗開錢。”又是五個月過去了，山洪暴發，井老了。資本家和狗腿子們吃得飽飽的，裝得滿滿的，偷偷溜走了。我們這些人又拖着枯瘦的骨頭架子，喝着西北風到處流浪。

人不如狗

在那种年月里，任你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条生路，我只好又回到华东公司这个虎狼窝。

两年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矿山，工人的生活，真是胡萝卜敲钟，越敲越短。最初，一个大班（二十四小时）给四斤粮食。以后粮食换成高粱面，高粱面换成橡子面，橡子面又掺上锯末马粪，吃了就拉肚子，病死、饿死的人一排排朝外拖。可是，矿上大米白面堆成山，资本家、日本鬼子情愿把大米、白面倒在阴沟里去喂狗，也不给工人吃。日本鬼子后田太郎的大洋狗和后田、朱耀如平起平坐，吃大米白面，而且不给菜汤它不吃，菜汤里面没有肉它不吃。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人人心里压着一团怒火，恨不得有一天和它们拚个你死我活。

有一天，我排了三个多钟头的队，领到的又是一点烂土豆和斤把橡子面，看看这些狗都不愿吃的东西，气得我头上冒火，血冲喉嚨管。我禁不住骂了一句：“他娘的，大米白面都叫狗吃了嗎？”一句话，闯了个塌天大祸。一个汉奸走过来，打了我两个耳光。接着又把我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顿。他的

手累癱了，鮮血濺滿了他全身，血腥味冲着他的鼻子才罷手。后来还是穷兄弟們出来說好話，給我作保，才把我从树上放下来。

二十块钱一条命

一九四三年，遇上了大旱，处处荒草，遍地荆棘，人們成群結队，扶老携幼四处逃荒。日本鬼子乘机招“劳工”。我不管此去是凶是吉，将自己卖了二十块钱，到了枣庄，又开始了另一段悲惨的人間地獄生活。

到枣庄的第二天，日本鬼子用明晃晃的刺刀，对准我們的胸膛，在我們額上打上烙印，在我們身上挂上蓝底白字的卖命牌。从此，我們成了被剝夺了自由的人，成了可以随便屠杀的对象。我的卖命牌是十八号，吃飯、睡覺、下井派活都叫“十八号”，“毕玉云”三个字从此被人遗忘了。

上下井的时候，护矿队、把头、特务，里三层外三层，荷枪实弹围得水泄不道。直到我們都到了井下，“迎送队”才哈哈連天地散去。

这时日本鬼子已面临最后总崩潰的边沿，黎明之前的黑暗籠罩着矿山。日本鬼子为了更残酷地搶

夺我国丰富的资源，对工人实行了更残暴的“人肉开采”政策。我们一下井就得干二十几个小时。夜深了，井下人晒马乏，把头、二鬼子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带着皮鞭、手镢头(带尖的铁锤)下井监督工人，高兴打就打，高兴吼就吼，“开血啦”的咆嘯声，此起彼落。一听到“开血”的狼嚎声，工人就知道要打人了。这时只听得工人拉筐急行的唰唰声，皮鞭落在人身上的噼啪声，真是阴风惨惨，杀气腾腾。多少工人被折磨成了残废，多少工人在这里断送了生命。人们忍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不到一月，招来的“劳工”就跑了一半。日本鬼子见跑的人多了，把围墙加到两人多高，墙头上嵌着碎玻璃，墙外面围上电网。即使这样，日本鬼子还是不放心的，又要我们头上留一撮毛，睡觉时浑身上下脱得一丝不挂，屋门上还加上大锁。我们没有出入自由，没有大小便自由，一天到晚不是象猪猡一样关在“筒子屋”里，就是象牛马一样赶下井去。

到枣庄三个多月后，徐州“寒病”流行。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头发一把把地脱落，鼻子不断地滴血，不能吃，不能动。鬼子害怕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工具全毁了，没有人给他们挖煤，便把患病的人集中到

一个不見天日的大屋里去隔离。到了这里的人，十个有九个活不了命。每天晚上，都有两个日本鬼子带着防毒面具去检查。什么检查！簡直是糟踐人。病人躺在地上，他們用脚踢打踢打，还能“哼”一声的留下，哼不出声来的，或者哼的声音小一点的，就被装进口袋，拖出去活埋。我害怕他們把我活埋，每次当他們用脚踢我的时候，就拚命地哼一声。我一連害了五十多天病，被踢了一百多次。

和我一道去的二十三人，跑掉了三个，死了十六个，还剩下四个，要繼續呆下去，也是死路一条。这年年底，风卷着雪花团团轉，我趁日本鬼子一时疏忽，蹬上一輛破車，跳出了两人多高的围墙，逃出了虎口。我渾身上下只剩一条褲衩，到了費县，一个好心的大娘，見我快冻死了，留我吃了一頓飯，送我一条麻袋，一双破鞋，才保住了我这条命。

回到我曾經住过的地方，两間茅屋早已倒塌，母亲和哥哥已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亲手栽的一棵小枣树。我見不到母亲，不禁滿腔悲憤。

这就是我在旧社会闖煤窑二十二年的結果。我流干了眼泪，洒尽了鮮血，受尽了侮辱，尝尽了苦辣。紅肿未消，皮鞭又来；旧疤未愈，新痕又盖；

右臂刚好，左腿又折；吃的猪狗食，出的牛马力；穿的麻袋片，住的“閻王殿”。黄连虽苦，沒有我的身世苦，海水虽深，沒有我的仇恨深。

衷心感謝毛主席

盼星星，盼月亮，盼出了东方紅太阳。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我的家乡山王庄。使我砸碎了身上的脚镣手铐，象入水的魚，象出籠的鳥，永远結束了那暗无天日的人間地獄生活，跨进了幸福的人間天堂。

有一天我正在井下攙煤，区长忽然告訴我：“玉云，快上井，你母亲来了！”

天哪！这是真的嗎？我又惊又喜又怀疑，跨出井口，連工作服都来不及換，就走进了工会办公室。果然不錯，正是我日夜思念着的母亲。我一声娘沒叫出来，眼泪先出来了。

看看母亲額角上的皺紋、蒼老的双頰和伴随她的一个小包袱，总觉得象少了个什么似的，就着急地問：“娘，哥哥呢？”

“孩子！別提了吧。”母亲伤心地說。“当你卖‘劳工’到枣庄后不久，你哥哥就……餓……死了。”

沒想到第一句話就刺痛了母親的心，我說：“娘！別再談這些傷心的往事了，咱回家去。”

到了家里，娘看了看缸里裝的雪白的面粉和金黃色的小米，惊奇地問道：“唉呀，哪儿來的這麼多糧食呀？孩子，咱是窮人出身，咱可不能干那些沒良心的事呀！”

她老人家怕我是走邪道弄來的。我告訴她這是我的工資糧，她還是不相信，說：“在舊社會，你累斷脊梁折斷腰，闖了半輩子竇，也沒弄到這麼多糧食呀。”

我說：“娘，那是舊社會，這是新社會呀！”

回家後的第三天，母親特地到集上買了張毛主席的畫象，掛在堂屋中間。她樂滋滋地說：“如今咱可不能吃了大米白面忘了恩人共產黨和毛主席呀！”

在領導和同志們的關懷下，一九四九年九月，我結了婚。不久，我又當選為淄博市人民代表，出席了市人民代表大會，管理國家大事。一個在舊社會受盡了折磨和侮辱的“竇化子”，能有今天，怎么能不激起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呢？我真是越活越年輕，越干越帶勁。一天不下井，我的手就痒；



一天不聞到煤層的味，心里就悶得慌。解放以來，我一股勁干了十六年，上下班從來沒有遲到過，沒有早退過。為了照顧我的身體，領導要調我到井上工作，我考慮來考慮去，還是舍不得離開井下。今年我雖已五十多歲了，使鎬頭不如小青年利索，可管理頂板、維護巷道、移溜子的活還不含糊。我對

領導說：“我在井下呆慣了，能多呆一天，就讓我在井下多呆一天吧。”

在黨的關懷教育下，我不過做了一個老工人應該作的一點工作罷了，可是，黨給了我很大的榮譽，先後被評為礦、局、市先進生產者三十餘次。一九五九年，還光榮地出席了山東省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基建、交通積極分子代表會。

是黨和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推倒了壓在我身上的三座大山，把我從死亡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是黨和毛主席砸碎了我身上的腳鐐手銬，把我從地獄帶進了天堂，是黨和毛主席使我永遠擺脫了窮困和飢餓，把我引進了富裕和幸福的樂園，是黨和毛主席使我永遠結束了奴隸命運，成了新社會的主人！

張若冰整理

